

中国文化自信的日常生活智慧

——评王充闾《国粹：人文传承书》

■ 古 昶



《国粹：人文传承书》
王充闾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时至今日,中国的思想、文化和学术风气,正朝着本土化方向强势回归。这一全新语境把一个由来已久而又常说常新的话题,再度摆到作家学者面前,这就是:我们该以怎样的态度、理念和方法,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方面,补苴罅漏,正本清源,“我注六经”,固然必不可少;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立足时代认知的制高点,亮出自己的胸襟与目光,博采众长,取精用弘,“六经注我”。因为只有这样,中国传统文化才能在精神淘洗和历史砥砺中,不断激活底蕴,融入新质,从而与时俱进,实现自身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笔者愿意向文坛和学界郑重推介文史大家王充闾先生的历史文化作品新著《国粹：人文传承书》(以下简称《国粹》)。这部洋洋洒洒36万言的作品,聚焦5000年中国文化史,其行文洒墨、取材立论自是保持着作家一向奉行的扎实、缜密与严谨,然而统摄全书的最大特点,却是悄然贯穿和浸透于字里行间的属于作家特有的历史意识、文化情怀、人格理想、审美趣味、价值判断,它们无形中完成了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别一种描述与解读,同时也凸显了作家历史和文化回望的个体风范,其文心所寄,很值得认真揣摩和仔细回味。

“文主秦汉,诗规盛唐。”“书不读汉唐以下。”这样的说法,如果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加以审视,大抵难免有刻舟求剑、泥古不化之嫌;不过,倘若就学术研究而言,却又不能不说它颇有道理。因为研究者要在广度与深度的结合上把握传统文化,确实需要从精读元典、洞悉上游、夯实基础入手,确实需要一种溯源而上、由源及流的认识与能力。张之洞所谓:“读书宜多

读古书,除史传外,唐以前书宜多读,为其少空言耳。”余嘉锡断言:“欲研究中国学术,当多读唐以前书,则固不易之说也。”都包含这层意思。对于这一问题,充闾先生似乎未做直接论述,但从他近年来的创作与研究多围绕先秦展开且硕果累累的情况看,他应当与张之洞们“所见略同”。而一卷《国粹》亦可证明这一点。该著拿出多个章节专门透视先秦和汉唐文化,它们或从容叙事,或睿智析理,均可谓深入浅出,别有会心。譬如,《生生之为易》在充分吸收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锁定“生命之学”“生存之学”和“发展、变易之学”三个维度,深入发掘和精心诠释《易经》的丰富内涵,从而在本源意义上揭示了中华民族何以能够久历沧桑,却生生不息。《士君子》从王安石的怀古诗《孟子》说开去,其生动的夹叙夹议,不仅勾勒出孟子其人雄强善辩、清高自持的风标气度,而且凸显了这位“亚圣”于思想史和儒学史上的独特贡献,如呼唤知识阶层的群体自觉,高扬“民贵君轻”的旗帜,发展儒家的“民本”观念等。这时,孟子的话题便与时代潮流相衔接。还有《始祖》《鸿蒙开》《秦始皇之道》等文,均采撷不同的历史事件或文化现象,展开钩沉与思考,就中完成了对先秦乃至远古历史重要段落或场景的新颖解读,同时也传递出作家渊博扎实的学问功底。这样一些立足源头、厚积薄发的篇章,带

给全书的是一种幽邃旷远之境、高屋建瓴之美。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为中心意脉,以儒释道多元互补为基本形态。其中道家与释家相对于儒家,都是边缘性、异质性的存在。而道家与释家相比,少的是哲理性和仪式性,而多的是本土性和世俗性。唯其如此,道家对国人性格和民间习俗的养成,对中国文化尤其是文学艺术的变易与发展,都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正如鲁迅所说:“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然而,不知为何,鲁迅的说法并没有得到充分呼应,迄今为止,道家文化在文学世界仍是一种清浅模糊的存在,对道家文化素有研究的充闾,显然希望促进现状的改

观,而一卷《国粹》便有意强化了对道家文化的梳理与推介。请看《道家智者》。该篇在开阔的文化视野之下,着重解剖道家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庄子始终如一“做减法”的生命实践,其精到的条分缕析,既阐明了这种生命实践的心理依据,又归纳出它何以可能的精神途径,其结果是不仅彰显了庄子其人的个体追求,而且完成了对道家文化的浓缩性提炼。《邯郸道》涉及曾经在古赵大地长期并存的儒家和道家文化。但透视和分析的重心分明还是后者——流传逾千载的“黄粱梦”和吕翁祠,以虚幻离奇的故事,演绎着“凡功名皆成梦幻,无少长俱是古人”的道理。这当中无疑包括着消极成分,但也不无合理元素:对利欲熏心、贪得无厌者,它不啻当头棒喝;而对命运乖蹇、求进无方者,它又何尝不是一种心灵抚慰?这时,道家文化的积极意义,以及它与儒家文化奇妙的转换与互补关系,获得了清晰而客观的展现。《千古文人心》《达人境界》分别阐释李白和苏轼两大文豪的命运轨迹。其场景与事件自是缤纷摇曳,但内中贯穿的却是一种清晰自觉的理性判断:儒家支撑其社会行为,道家成就其艺术实践。这是作家对道家文化的别一种观察与解读吧?这样的努力使中国传统文化愈见斑斓、繁复与博大。

《国粹》是以文学为主视角的文化史建构。既然是史的一种,它

就必然要遇到如何处理历史上“人”与“事”的关系问题。对此,充闾先生提出“事是风云人是月”,从而“烘云托月”的观点。他认为:“历史中,人是出发点与落脚点。人的存在意义,人的命运,人为什么活、怎样活,向来都是史家关注的焦点。”(《中国心》)事实上,正是这样的观点幻化为《国粹》的中心线索。请看构成全书的四大板块:第一章“人文命脉”,集中讲述庄子、孟子、秦始皇、李白、苏轼、纳兰性德、袁枚、曾国藩等历史人物的思想、艺术、性情和命运,涵盖了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仁人志士、英雄豪杰等先贤,其笔墨所至,或知人论世,或由史通心,而落脚点都是为现实人生提供滋养与借鉴;第二章“生命符号”,相继介绍贺兰山岩画、广陵散古曲以及诗词密码、楹联趣味、姓氏文化、座次学问等。它们是文化的积淀与升华,但更是心灵的投射与创造,是人对自身的审美化与对象化。第三章“文明大地”,着力呈现“三峡气象”“江南传奇”“凉山云和月”“丝绸之路”等人文地理,但行文洒墨并不是单纯的模山范水、借景抒情,而是在此基础上,调动时空交错、散点透视的手法,牵引出相关的历史人物,从而增添江山的人文色彩和大地的精神重量。第四章“生活智慧”主要从制度和观念层面,切入传统文化和古人生活。作家的初心与重心始终是,在关注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意义上,烛照其精神生态,弃扬其文化传统。由此可见,对于读者而言,《国粹》是诗意盎然、情采飞扬的一部文化史、传统史,但更是深思熟虑、自成一家的心灵史、精神史。它所传递的不单单是文学家的历史意识,同时还有以《左传》《史记》为开端的文史合一的写作方式。

闫文君的这本《名人》,正是我们等待已久的一本书。十多年前我就关注名人问题,发现大部分研究这个重要社会现象的文字,是“如何做名人文化产业”的赚钱书。似乎整个知识界读书界都没有明白,这个名人狂热,是一种文化病的症状。

人类社会的“名人病”,由来已久,只是于今为烈。但是至今为止,书市上唯一一本讨论名人崇拜的书,是美国人汤姆·佩恩的《盛名之下:古往今来的名人崇拜与我们的生活》。人类并非向来有此病,古代名人大多是帝王将相、神仙圣徒,后来增加了著名科学家、文化人。崇拜有成就之人,绝对不是病。而当今文化中的名人,是做什么的呢?

前阵子全国报纸纷纷刊载消息:25年前曾经在某电视剧中演重要人物的某演员七十多岁高龄仙逝,人们沉痛哀悼,网上泪奔洪水,告别仪式隆重。傍晚我走过大学校园,抬头看到一张半页报纸大的简单告示:某某著名退休教授、中国第一部古典美学史的作者不幸去世,本系教职工不胜哀痛云云。告示昨天新贴,却已经风吹雨打半边剥落,无人注意。

我们见惯不惊,知道每一代人都会有自己这一代的名人;每一代的歌星唱得如何,不必与前人比;名人是一种社会共时性需要。问题是:谁有资格当名人?十年前,英国某机构曾在街上随机找路人,做了一个“名人识别率”测验。结果实在惊人:能识出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只有10%;甚至能认出当时照片天天见屏幕的萨达姆的,也只有

我们都在生“名人病”

——评闫文君《名人》

■ 赵毅衡

20%。至于英国文学经典大师,境况更惨。知道《失乐园》作者名叫密尔顿的,只有3%;年龄组之间的巨大差别,更让人震惊。越是年轻,越是无畏无知:18-24岁年龄组,得分最低。知识面“最好”的似乎是45-54这个中老年段。问一个十多岁的少年,“希特勒是谁?”答曰:“好像是邱吉尔的朋友。”面对当时美国总统布什的肖像,被测者,一个穿着时髦的年轻女子兴奋地叫起来:“这人我认识,是克林顿!”电视台放出这场面,教师们晕了过去。

说英国老百姓实在笨得出奇,不公平,因为另一些人被识别率奇高,那就是娱乐明星。英国连续上演了近20年的电视连续剧《东区人》,几乎有一半被测者能说出5名以上主角,识辨率超过任何政治家。

美国有个统计数字:全国有200万“职业作家、艺术家、体育家”。这则统计,只谈“职业”,可用艺术谋生。少数球星之外的大量学校体育教师、少数明星之外的大量戏剧俱乐部指导、少数作家之外的大量写作课老师、少数音乐家之外的大量音乐课教师等,还都不算在内。美国总人口2.7亿,儿童除外,只算2亿。如果全国有

200万人能以此为职业,那么每100人,可以出一个娱乐文化的“职业人士”。

现在我们假定平均每个人能记住1000个人名,那么这些职业“成家”者修炼成名的比率就是:2000个职业人士中可能有一位佼佼者“名人”。也就是说,声望之塔尖每一位幸运儿,社会上平均就有20万个人在仰望,并且有2000位“同行”在嫉妒。

我不知道中国的“名人”与俗众的比例,或许与上面美国的数字差得不远,类似的实验统计值得一做。为什么会如此极端的名人“王者荣耀”?因为现代社会人过于孤立,只有靠与名人连接,俗众才能有“属于这个社会”的感觉。先前的社会,邻里串门,飞短流长,每个人都是本村名人。现在的城市居民,互相不便接近。于是电视报刊代替三姑六婆,“实拍节目”代替了窥视邻居。如果请一群社会各阶层各单位的人坐一桌吃饭,大家都能听得懂插上嘴的题目,只能是最近几天娱乐明星们的八卦。

整个社会“休闲化”趋势,无人能改变,争论只在于,今日名震全国的这些娱乐界

人物,是否有享受如此大名的“资格”?

- 问:谁是名人?
答:具有“知名度”的人;
问:谁具有知名度?
答:报刊愿意报道的人;
问:报刊报道谁?
答:名人。

“名人如何获得知名度?”这个许多文化学家弄不清的难题,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有了名,所以就有名。

年前我有一篇长文,讨论当今媒体的文化“往下笨”问题。很多人认为这个问题在中国不存在——中国是“往上笨”。理由是:中国社会不久前还是散落的村庄,城市化才没有几天,老百姓刚有机会成为娱乐追星族,先让他们追一阵子不碍事。

问题是,几代人追娱乐明星之后,还认识其他人,知道其他事否?一个社会只能以娱乐明星的飞短流长作为胶合剂,作为唯一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是否太脆弱了一些?在“名人文化”上,我拿西方人开涮。其实在许多文化问题上,西方的今天,就是东方的今天;东方的明天,也就是西方的明天。这真是令人苦恼的“地球扁平化”。

上面我说的只是一些让人哑然失笑的病状,笑谈容易,诊病就太难。至今我读到过的最犀利的解剖,是闫文君的这本书《名人》:她的诊断之犀利,她的搭脉之准确,值得我们细读;她提出的问题,她的病人膏肓警告,要求我们每个人深思并回答。

(《名人》,闫文君著,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